

中國現代史

· 資料選輯 ·

第三分冊 土地革命

1949

河南大學政治研究室翻印

第一輯 參考史述

一 中共領導下的十年蘇維埃運動

廣州起義失敗之後，反革命者對於起義之工農羣衆，大肆屠殺，白色恐怖遍於全國，然而，反抗武裝鎮壓與殘酷剝削制度之起義事件，仍風起雲湧，尤其是在北伐中羣衆工作深入的地區，如湘、鄂、贛、粵諸省，農民自動的實行武裝自衛，抗租抗稅，不斷的與軍閥地主發生衝突，一九二七年秋，爲了保衛秋收而廣泛的爆發了「秋收起義」，各地起義之農民堅決英勇的與豪紳地主之武裝進行了激烈的戰鬥。由於各地農民起義先後不一致，相互之間的聯繫配合不夠，或則因毫無準備，結果許多地方在軍閥武裝的殘暴鎮壓之下遭受摧殘。但是在羣衆基礎較爲鞏固且在英明的毛澤東領導之下的湘贛邊及井崗山區城，農民運動却始終堅持着：一九二八年四月下旬毛澤東所部游擊於粵、贛、湘諸省，並與發動湘南起義的朱德、陳毅所領導之部隊會合，成立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兼第十師師長，毛澤東爲黨代表兼十一師師長，陳毅爲第十二師師長，他們並在羅霄山脈中段一帶，建立了革命的工農專政的民主政權——蘇維埃政府，實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政策，在軍事上提出了以游擊戰爭爲基本方針，和游擊戰爭的戰術原則，在軍隊中建立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政治工作制度，這是在中共領導下，土地革命運動中，第一個革命根據地，和第一支正規的紅色武裝的創立。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懷，黃公略於平江起義，不久與井崗山部隊會合，開闢閩粵贛蘇區，此外又有鄂豫皖蘇區，鄂東蘇區，陝甘蘇區，湘鄂西蘇區，閩浙贛蘇區的建立，廣西左右江，粵東江，海陸豐及海南島一帶蘇維埃運動也相繼地發展起來了。

一九二八年八月，中共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正確的總結了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決定了今後奮鬥的總方針，大會指出大革命所提出的中國革命之基本任務——反帝反封建，並未解決，革命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大會號召全國的勞動者們，為徹底實現民主主義的蘇維埃的新中國而奮鬥。並提出了現階段革命的政治綱領：（一）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二）沒收外國資本的企業和銀行；（三）統一中國，承認民主自由權；（四）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五）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六）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失業救濟，與社會保險；（七）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耕者歸農；（八）改善兵士生活，發給兵士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政府軍閥地方的捐稅，實行統一累進稅；（十）聯合世界無產階級與蘇聯。

當時，各帝國主義國家，正陷於空前未有的世界經濟恐慌之中，而中國內部連年軍閥混戰，和國民黨政府黑暗專制以及殘暴的屠殺政策，早已弄得民怨沸騰，此外因破產失業、災荒饑饉而引起的民間騷動，都便利於蘇維埃運動的發展，在城市中，工人運動重又勃興起來，一九三〇年，中國革命已經開始了新的高漲，同年夏天，在李立三主持之下召開全國紅軍與蘇維埃代表大會。李立三主觀主義的對於正在開展的革命高潮現象，作了誇張的估計，以為當時世界革命與中國革命的形勢俱已成熟，乃號召全國工農大衆普遍進行武裝起義，竟提出了要紅軍主力進攻長沙、南昌、武漢等大城市的盲動主義之任務，使紅軍和全國工人運動都遭受了相當大的損失。但紅軍經過幾次大的戰役之後，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糾正了盲目的軍事行動，紅軍實力得以保存。

中國工農紅軍，在廣大的勞苦羣衆的贊助之下，擊潰了在數量上、技術上都佔絕對優勢的國民黨軍閥軍隊對於閩粵贛蘇區所進行的第一次（於一九三〇年十二月開始），第二次（一九三一年四月）；和第三次（一九三一年七月）「圍剿」。同時，又肅清了混入蘇區內部的

反革命組織「A.B團」的破壞陰謀，蘇區的力量和地位，更加強人和鞏固了。

由於全國蘇維埃運動的發展，各地蘇區的建立，和各地蘇區的日臻鞏固與擴大，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乃於江西瑞金召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正式選舉了臨時中央政府，推毛澤東為主席，大會製定了憲法草案，規定中國蘇維埃之目的：「是在消滅一切封建殘餘，趕走帝國主義列強在華勢力，統一中國，有系統地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國家的經濟建設，提高無產階級的團結力與覺悟程度，團結廣大的貧農羣衆在他的週圍，以便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

蘇維埃政府實行了下列的各種基本政策：（一）關於民主制度：一切過去被壓迫，被剝削的民衆男女一律平等享有無限限制的民主權利，市與鄉蘇維埃由勞動人民直接選舉，建立真正羣衆性的廉潔政府，切實保證羣衆在革命中所得的一切權利，並利用革命武裝與革命法庭鎮壓一切反革命的活動；剝奪一切帝國主義及剝削階級之特權；（二）關於土地政策：以依靠雇農、貧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與消滅地主的土地革命路線，徹底地消滅地主經濟和封建剝削制度，無代價的沒收一切地主的全部土地財產，沒收富農的好田，分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士兵，和農村手藝工人，無條件的廢除高利貸，取消苛捐雜稅；（三）關於勞動政策：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訂立勞動合同，增加工資，失業救濟與社會保險，改善青工、婦工和學徒的待遇，組織職工會；（四）關於財政經濟政策：實行統一累進稅，取消一切苛捐雜稅（國民黨區苛雜名目共有一千七百五十六種），發展國民經濟，有計劃的調節、扶助、獎勵農、工生產事業和私人經濟，組織對外貿易，擴大合作社運動；（五）關於文化教育政策：實行免費教育，推行識字運動和社會教育，並創立各種幹部學校，及高級研究機關；（六）關於紅軍建設：以少數民族關係等均有正確的政策。

蘇維埃政府建國的精神，和這些具體政策實行的結果，實質上是真正繼承了大革命的传统精神，實現了孫中山先生偉大的革命理想。

各地蘇區建設突飛猛進的過程中，數千萬蘇區人民，過着從來未有的無民族壓迫、封建剝削的，民主自由，勞工解放和「耕者有其田」的、幸福愉快的、真正三民主義的生活，與黑暗的南京政府統治下的廣大地區相比較，形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產黨鑒於民族危機的加深，和全國反日運動高漲，提出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基本口號：「武裝人民，進行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以保障中國民族的獨立，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得到了全國廣大人民的擁護。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四日，中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正式公佈對日宣戰（國民政府則在全面抗戰四年後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才正式對日宣戰），並頒佈了對日作戰的總動員令。號召全國民衆開展民族革命戰爭。同時，在蘇區積極的進行紅軍之建設，以便作爲抗日戰爭的中堅力量。當時由於土地革命的深入，游擊戰爭的開展，和赤衛隊、游擊小組等人民武裝的普遍組織，蘇維埃政府並頒佈了各種優待紅軍及其家屬的法令，採行自願兵役制，經過政治動員的方式，使成千成萬的勞動人民湧進紅軍。紅軍中工農幹部的成份增加，保證了紅軍階級成份的純潔，和共產黨在紅軍中絕對的領導地位，紅軍中政治委員制度，與政治工作制度建立，創造和鞏固了官兵一致、軍民融洽、和艱苦奮鬥的優良作風。政治文化教育的進行，提高紅軍士兵的政治覺悟程度，鞏固了紀律與戰鬥力；整編的結果，使紅軍在組織上更加正規化，在軍事技術上也比前提高了。因此紅軍日益迅速的擴大與鞏固了起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成立，統一了全國紅軍的領導，使各個蘇區，各個戰線的紅軍部隊，開始在統一的戰略意志之下，互相呼應與互相行動起來。紅軍在歷次「圍剿」與反圍剿的戰役勝利之中，根據中國革命基本特點，戰役形勢和總的政治任務，對於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的科學原則，也有新的創造和不斷的發展。確定了以弱敵強、以少勝多、以分散對集中、以鄉村對城市的戰略方針；確定了內線持久的戰略戰術；確定了速戰速決的進攻戰的戰略戰役方針；確定了游擊戰、陣地

戰、運動戰配合運用的戰役戰術方針；確定了統一戰路意志下的獨立自主的游擊戰方針；確定了進攻時反對冒險主義，防禦時反對保守主義，轉移時反對逃跑主義，游擊時反對游擊主義的原則。蘇維埃政府，在「一切爲着前線勝利」的口號之下，對於紅軍給養與供給、衛生治療等等的保證，盡了最大的努力。這樣，紅軍便成爲中國唯一的不可戰勝的革命武裝。

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中國蘇維埃政府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中華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主席毛澤東報告蘇區建設經驗，總結蘇維埃各種政策實施情形與收獲，在蘇區因爲實行革命政策之結果，消滅了封建地主的剝削制度，農民、士兵都分得了土地，人民安居樂業，豐衣足食，比革命前的生活大大改善了。一年之中蘇區戰物收成增加百分之二十，工人工資增加數倍，待遇改善，一切羣衆都有着自己的組織，享受着蘇維埃的各種民主權利，雖在敵人的封鎖破壞之下，蘇區仍日趨繁榮、鞏固與擴大。大會并總結了幾年來鬥爭的經驗，提出了動員羣衆，反對敵人即將到來之第五次「圍剿」的具體步驟。

第一次大會閉幕不久，國民黨軍隊即由閩回師，開始他們曾經長期準備了的第五次「圍剿」，蔣介石改變了作戰方針，聘德人賽克特爲顧問，採取步步爲營，穩紮穩打的堡壘政策，並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口號，來進攻紅軍，在帝國主義的各種支援之下，蔣介石親率大軍百萬，對中央蘇區實行重重包圍，四面進攻，此時，紅軍在軍事領導上發生錯誤，輾轉於敵之主力與堡壘之間，完全陷於被動，一九三四年秋，敵人迫近蘇區腹地，贛昌戰役後，「單純防禦路線」造成了蘇區極端嚴重的形勢，欲在內線與敵決定性之戰爭已屬不可能。乃轉變戰略方針，避免與敵作過早之決戰，保存紅軍主力，決定突圍北上，實現民族革命戰爭之主張；同年七月，組織北上抗日先遣隊，由方志敏等率領，經閩入浙向北進發。另外又組織西進遠征支隊，由蕭克、任弼時率領，向贛西湖南挺進，積極宣傳調動敵軍官兵停

是內戰一變抗日之主張。同年十月，除留部份負責幹部率領軍區武裝堅持游擊戰爭外，主力紅軍（一、三、五軍團），乃實行突圍，從福建、江西出發，經過了廣東、湖南、廣西、進入貴州。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遵义會議，糾正了五次反圍剿中單純防禦路線的錯誤；集結主力於遵义附近擊潰國民黨軍隊的追剿部隊，進行了半個月的休養補充之後，復向雲南突進，繞道川廣邊境轉入四川，與紅四方面軍會合於豐功。河口會議之後，張國燾違反繼續北上的決議，舉兵南下，造成紅軍的分裂局面。但紅軍第一方面軍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之下，經過甘、陝境內的建甯戰鬥之後，於一九三五年冬，勝利的進到陝北蘇區，完成了舉世矚目的紅軍主力北上抗日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紅軍進入陝北之後，就達到了抗日的前進陣地。更便於實現其抗日主張，所以七七事變爆發後紅軍一經改變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就能迅速進入山西、河北，及時挽救了華北全面淪陷之禍。

二 「九一八」到「七七」

（一）「九一八」事變

一九二九年，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爆發，除蘇聯外，世界各國，都陷於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中，帝國主義列強為了逃出這個危機起見，企圖挑起重新瓜分殖民地及勢力範圍的戰爭，來取償於防衛薄弱的國家。特別是先天不足的日本帝國主義，在經濟危機爆發之後，對外貿易驟然減縮，商品輸出自一九二九年——三一年，兩年之間竟銳減百分之四十五，因此滯貨堆積，生產停頓，失業工人和破產之農民激增，而地主資本家更加重了對於勞苦大眾之剝削；日本工農大眾反抗地主資本階級和天皇制度之革命運動，則日益增漲。因此，日本帝國主義乃企圖以積極進行其大陸政策，滅亡中國之侵略行動，來緩

和國內革命危機之威脅，彌補其在經濟恐慌中所遭受之重大損失，同時還準備侵犯蘇聯。

日本自滅了朝鮮，便銳意經營滿蒙，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它在滿蒙一帶大量的投資，依靠南滿鐵路和旅順、大連等港口，操縱了東北人民的生計，享受着奴役中國人民的各種特殊權利，儼然以滿蒙的主人自居。但自華府會議以後，英美各國過剩的資本源源不絕地輸入到了滿洲，使滿洲在中國的「民族資本」的美名之下，與築瀋海，吉海鐵路與北齊路聯接；打通齊克路直達北滿，與日本之南滿路發生「並行錢」之衝突，開葫蘆島為商港，亦予日本之大連以商業上的打擊，此外開辦工廠，設學校，並懲雇奉軍改制易幟等，這些活動，無不使日本帝國主義感到嚴重之威脅，英美與日寇之間，在滿洲利益上尖銳的對立，引起日本帝國主義的焦急。欲尋一切可能之機會，製造事端，以便排除英、美之勢力，而將滿蒙完全變為自己的殖民地，而使略滿蒙乃為其推行大陸政策，滅亡中國整個陰謀之第一步。

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危機，不但促進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慾望，同時還使它認為侵略中國的時機已到。因為此時歐洲列強及美國正在完全忙於國內經濟危機所引起的事情，自顧不暇，蘇聯也忙於國內社會主義的建設，而中國又內亂不止，防禦薄弱，於是他便積極部署以武力侵吞滿蒙之計劃，一面使國內機構日趨法西斯化；一面則屯兵於朝鮮邊境。一九三一年夏，在南滿路兩側增兵達二萬餘，潛匿東北之所謂「日本在鄉軍人」亦在七千人以上，日駐滿警察亦增至五六千名，在南奉路沿綫更築有砲台八十餘座，此外又派遣浪人，勾結流氓、「胡匪」、「蒙匪」，共約數千人。這些準備就緒之後，乃製造種種「地方事件」，向中國挑釁，一九三一年七月二日，在吉林萬寶山地方，日人驅使韓國農民攔河築壩，強掘民田，與中國農民發生衝突，日本軍警則開槍慘殺中國農民，這就是所謂「萬寶山慘案」。此案發生之後，日寇蒙蔽真象，捏造事實，日報在朝鮮大肆煽惑，誣中國屠殺韓農，虐待鮮民，朝鮮各地在日寇這種挑撥欺騙之下，乃發生激烈的排

華運動，七月上旬，漢城、仁川、釜山……各地的華僑被朝鮮暴民和日本浪人慘殺的在數千人以上，華僑商店住宅悉被燒燬，這就是「朝鮮排華慘案」。萬、鮮兩案發生之後，我外交當局雖盡力抗議，均無結果。不久又有所謂「中村事件」發生，日本參謀本部之官吏陸軍上尉中村麗太郎，以遊歷爲名，往內蒙作軍事密探，於八月間失蹤。日寇認爲興安嶺之屯墾軍所殺，張皇其詞，大肆宣傳，並迅速調兵赴滿州各地，準備戰爭。九月十八日夜，日軍乘我無備，自行爆毀柳河鐵橋，反認爲中國軍隊所爲，引作口實，不宣而戰，大舉進攻，以重砲轟擊瀋陽城垣，攻佔北大營，旋即佔領瀋陽兵工廠，以及各機關，這就是震動世界的「九一八」事變。

事變發生之日，東北邊防軍奉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命令，一槍不發而退出了瀋陽。同日，日軍又佔領營口、莊台、蓋平、欽嶺、昌圖、開源、安東、鳳凰城、撫順、延吉等十餘縣。同時，南滿路北端日軍亦迅速襲擊長春，進逼吉林，吉林省代主席熙洽投降，二十一日吉林爲日軍佔領。十月八日，日飛機隊大舉轟炸錦州，此後通遼、開原等地亦不斷受日機襲擊，東北軍將領則奉行不抵抗主義，繼續撤退，僅數日間，遼吉兩省萬里錦繡山河，就一變而爲日寇殺戮中國人民的屠殺場了。

日軍佔領瀋陽的消息傳出後，全國人民無不憤激填胸，紛紛組織抗日救國會，宣佈與日經濟絕交，檢查日貨，示威，遊行，請願，成立義勇隊，一致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但國民黨南京政府仍執行其錯誤的「不抵抗」、「不交涉」的政策，而希望英、美等帝國主義出面干涉。因此竭力向國聯申訴，請求制裁暴日。然而英、法帝國主義所操縱之下的國聯，因贊成日本反蘇，又無力制裁日本，故一味遷就日本，反替日本掩蓋侵略罪行，對中國採取敷衍態度，雖曾兩度決議定期要求日軍撤退，但結果均爲日本所拒絕。此後，日寇侵略之兇焰更加猖狂，一面進攻北滿，與當時孤軍抗日之馬占山將軍，和各地興起之人民自衛武裝部隊（義勇軍）激戰，一面則唆使漢奸賣國賊金鏡、

熙洽等組織偽維持會。日人士肥原，於天津維持溥儀東渡，籌組偽「滿洲國」傀儡政權。十一月十八日，日軍攻陷龍江，十二月，日軍分三路進攻錦州，東北軍完全退入關內，於是東北三省完全隸於日寇的淫威之下了。

【二】一二八上海抗戰及其後的局部抗日戰爭

（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

南京政府在東三省淪陷以後雖仍堅持痛退讓屈辱的不抵抗政策，但在高漲的羣衆反日運動的脅迫下，竟不敢公開承認「滿洲國」。日本帝國主義爲了想用武力脅迫南京政府，正式承認「滿洲國」，並遏它鎮壓人民的抗日運動，同時爲了向國際示威，於是發動了上海戰爭。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和尚五人，在上海虹口附近被人毆傷，日軍藉此唆使日本浪人，焚三友實業社工廠，並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議，要求懲辦道歉，封閉抗日團體，上海市政府完全接受日方要求，並立即封閉抗日會。而日軍竟於一月二十八日夜，大舉進攻上海關北。當時駐防上海的十九路軍，在民衆反日浪潮的推動下，自動的進行抵抗。

淞滬抗戰爆發後，全國人民振奮，中國共產黨發動了上海十萬日廠工人大罷工，並號召了許多工人、青年學生投奔前線，組織義勇軍與十九路軍並肩作戰，或擔任運輸、交通、偵察、救護等工作。上海各界民衆，也自動恢復了抗日救國會的組織，募集資金、物品，支援前方作戰將士。故在戰爭開始的十餘天中，日軍屢敗，增兵多次，幾度更換指揮官，始漸佔優勢。而南京政府，在汪精衛的策動下，命令十九路軍立即退出上海，停止抗戰，同時蔣介石派三旅人到上海，解除工人學生義勇軍的武裝，並強迫十九路軍繳械。上海的大資產階級們，亦多方設法，迅速結束戰爭。

上海的抗日戰爭，堅持了三十五天，日本軍隊死傷六萬，損失奇重，粉碎了日本軍閥四天佔領上海，一星期攻佔南京的狂妄計劃。但終因我方兵力薄弱，彈藥缺乏，得不到本國政府的援助，且受本國軍隊夾擊的威脅不得已於三月間退出淞滬防線，上海抗戰，遂告結束。

當十九路軍總退却以前，國民黨的親日派，經過英美帝國主義，已開始與日本進行和平談判，至五月初，便訂立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此後，中國軍隊便不准駐紮淞滬。

一二·八的抗戰，雖因親日派的出賣而失敗，然而它打破了日本帝國主義迅速佔領中國的迷夢，給「中國不能抗日」與「三天亡國論」者以迎頭痛擊。同時它提高了民衆武裝抗日的勝利信心，使民衆武裝抗日的運動，得到進一步的開展。

一九三三年二月，日本帝國主義者又集結重兵，佔領榆關，進窺熱河。熱省主席湯玉麟不戰而退，日軍垂手而據承德，未及一星期，便佔有熱省全境，於是日軍氣焰萬丈，想一鼓而下華北，遂又向長城各口進攻。當日軍進到長城各口時，中國駐軍堅守古北口、喜峯口一帶，給橫衝直入之日寇以痛擊，尤以二十九軍的英勇與敢，引起了全國人士的興奮，各地民衆，到處捐募款物，發出通電，慰問長城抗敵將士。

南京政府在親日派的把持之下，表面上唱着「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高調，暗地裏派熊斌北上，幫助黃郛與日軍談判妥協條件，不久堅持了兩個多月的長城孤軍抗戰，又被賣國的「塘沽協定」斷送了。「塘沽協定」中公開的內容有：（一）中國軍隊退出深東一帶；（二）日本可用飛機或其他方法在戰區內施行偵察，中國方面應予保護；（三）日軍退至長城一線；（四）在中日兩軍防線之中間區域，由中國警察維持治安。另外，還有祕密的附件。從此，深東各縣，遂爲敵人所有，華北之門戶洞開，日本帝國主義可以隨時侵佔冀察，威脅平津了。

日本帝國主義在進攻長城各口時，它還組織了偽軍張海鵬李守信

停部，攻收察哈爾省。五月下旬，多倫不守，豐北、沽源等又相繼淪陷。當時，北方的進步將領吉鴻昌、方振武、馮玉祥等，在華北民衆抗日運動高潮的影響下，自動捐軍，組織「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發動了人民武裝抗日鬥爭。同盟軍成立之初，不過幾千人，自經發動後，各地武裝軍民自動來參加的達十幾萬人。他們的槍械彈藥既不夠，給養又貧弱，還受到國內親日派的造謠破壞，在種種極不順利的條件下，經過了五十餘天的英勇戰鬥，竟將日僞軍從多倫沽源等地竊走，恢復了廣大的失地。後來，因國民黨親日派多方阻撓，派兵威脅抗日同盟軍，勒令解散，暗藏奸細托派份子張慕陶，又從同盟軍內部來挑撥離間，再加以日寇的嚴重武裝進攻，抗日同盟軍遂陷於失敗，方振武出國，馮玉祥調赴南京，吉鴻昌被刺未死，後復遭暗害，北方的隱蔽抗日戰爭，便進入暫時沉寂的狀態。

自局部抗日戰爭結束後，國內的局勢是：一方面人民與軍隊繼續要求全國武裝抗日；另一方面南京政府實行了新的恐怖政策，用武力鎮壓抗日救亡運動。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國紅軍向全國宣言，願意在下列三個條件下，與全國任何軍隊訂立共同對日作戰的協定：（一）立即停止進攻蘇區及紅軍；（二）立即給民衆以民主自由；（三）允許民衆有組織抗日義勇軍和武裝的自由。宣言發出後，感動了江西蕭紅的剿共軍隊，要求停止內戰，但爲蔣介石所拒絕。是年多，十九路軍在福建發動抗日事變，並與紅軍訂立抗日協定，但因託派份子的破壞和政客的播弄是非，以及領導者政策上的許多錯誤，遂使福建事變在很短期間招致失敗。

國民黨及其南京政府，雖然暫時阻止了國內革命軍隊的武裝抗日運動。但人民的抗日熱潮，仍然繼續高漲。一九三四年春，上海反日烈士潘洪生出殯，參加者三十萬人，形成了反日大示威。同年五月，國民黨先進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等公佈了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國內名流學者及抗日人民，簽名贊成者，共達十餘萬。此外，全國各大城市學生與職業青年的請願示威運動，連續不絕。國民黨的反動派

對於這些人民的愛國運動，竟變本加厲，改用了慘絕的恐怖手段，一九三三年，北平學生因公葬革命先烈李大釗，先後被捕者達千人，其中死於監獄裏的約四五百人。上海及各大城市的愛國青年，被捕被殺者，日有數起，蔡元培魯迅等也常接到暗殺的警告。國內名流楊杏佛，史量才二氏，皆在此時期慘遭暗殺。國民黨的特務機關任意抓人，連與抗日無關的社會正義人士，均在所不免，塘沽協定後的國內局勢，被一股恐怖逆流沖激成一片黑暗。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並不因南京政府的退讓屈服而緩進，相反約，却日益加急了。一九三四年四月，日本外務省發表了天羽的「四一七」聲明，公開宣稱欲變中國為日本之保護國，並明白的提出了將以武力保持對華的一切軍事政治經濟的壟斷權。這一聲明發表後，華北親日派的政客官僚，便彈冠相慶，大事活動，首先在五月間實行了華北與偽滿的通車通郵，設立關卡，接着減低日貨進口稅則，不久，日本外相廣田又發表了對華三原則，更加露骨地表示出日本企圖立即併吞華北，滅亡全中國的決心。

（三）華北事變與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漲（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四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步伐，愈走愈緊，它一方面高唱「中日經濟提携」，提出對華的三原則：一是共同防共；二是承認偽滿；三是經濟合作，想從政治和經濟上來引誘南京政府投降，另一方面積極增兵華北，利用漢奸親日份子作傀儡，在較隱秘的方式下，武裝佔領全華北。

● 一九三五年五月，日本關東軍藉口中國軍隊侵入非武裝區，向北平軍委會負責人何應欽提出苛刻要求，並由關外調遣大軍入關。當時何應欽氏乃與日軍司令官梅津談判，訂立了無恥的「何梅協定」，其內容為，（一）取消河北省及平津國民黨黨部；（二）撤退河北省的中國駐軍；（三）撤消河北省主席于學忠職，更換平津兩市長；（

四)撤消北平軍委分會；(五)停止河北省的反日活動。不久，察省主席宋哲元因捕獲日本間諜，被迫引咎辭職，於是冀察兩省主權，大半淪入敵手。

同年七月，漢奸殷汝耕在日本指使下製造了「香河事件」，十一月又策動了「請願自治」的暴動，把冀東二十五縣公開劃為「防共自治區」，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同時，日軍萬餘人開到臨榆，作為擴大偽自治運動的後援。華北的漢奸親日份子，便到處醞釀着「自治運動」。

日寇的武裝侵略，造成了中華民族的空前危機，華北自治運動，更震動全國，使各階層人民，都感到亡國滅種的大禍，迫在眉睫，到處發出了救亡圖存的沉痛呼聲。這時候，中國共產黨和它領導的紅軍，已放棄江西蘇區，長征北上抗日，同時根據國際國內的新形勢，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發表了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宣言，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並號召全國人民，不分階級，不分黨派，共同團結，挽救民族於危亡。「八一」宣言發表後，全國人士皆表示熱烈擁護，並得到一部分「剿共」官兵的贊同。但是國民黨的親日派與反動的當權者却固執成見，對日本繼續退讓，放棄國土陣地，把鎮守冀察撤退下來的幾十萬大軍，完全調到後方，追剿與堵截北上抗日的紅軍，對華北漢奸的偽「自治運動」，置若罔聞，而對人民則嚴禁編印抗日書報，取締一切抗日救國運動。例如日本認為上海新生雜誌侮辱了日本天皇，南京政府便遵命逮捕了新生雜誌的主筆杜雲之。並頒佈不得妨礙邦交，必難踐鄰的命令。

處在國防前線的華北人民，親身感受到日寇武裝壓迫的痛苦，已不能繼續忍受日寇漢奸賣國賊們猖獗行爲，憤激情緒，達於頂點，於是北平的青年學生，首先怒吼起來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各大中學校學生萬餘人，不顧敵人槍口刺刀的威脅，走上街頭，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自治運動」的壯烈口號，提出了「停止一切內戰，共同對外」的要求，當天向華北軍政長官提出六項條件

：（一）反對防共自治運動；（二）公開宣洩對日交涉經過；（三）不准任意捕人；（四）保障北方領土安全；（五）停止一切內戰；（六）給予言論、集會、結社、出版之自由，而軍政當局則以大刀水龍回答示威請願的學生，十二月十六日，他們又結合了三萬餘人，衝過大刀隊和水龍的封鎖，在前門召開了市民大會，「反對華北自治運動，爭取民族自由解放」的吼聲，震天動地，使準備即日成立的冀察政務委員會，不得不延期舉行。

一二·九，一二·一六的抗日大示威，打開了全國恐怖沉悶的空氣，使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進入了新的時期。接着一二·九而起的，有杭州、廣州、南京、上海、武漢、長沙等地的學生遊行示威運動，隨後，便是各地普遍發動的晉京運動。

一二·九，一二·一六運動激起了全國廣大愛國人士的同情與聲援，上海總工會、文化界及十四個法團皆通電反對「自治」，要求南京政府出兵討逆。國民黨元老尤烈、馬相伯等，對於政府的退讓屈服政策與壓迫愛國行動的行爲，也表示抗議，國民黨及其南京政府內部的許多愛國份子，也對親日派表示非常不滿，而同情抗日運動了。但是南京政府當局，仍以拘捕、恐嚇、和分化等種種方法，壓迫抗日運動，甚至頒佈了「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橫加鎮壓。

一九三六年春，冀察政務委員會正式成立，以宋哲元爲委員長，實際上還是半傀儡式的政權，一切重要政令的施行，均須得日本當局的同意，在這樣的特殊政治局面下，日本帝國主義吞併華北的計劃，便逐步實現了。在經濟上，它以大規模的走私政策，排斥英美的華北市場，摧毀華北的中國民族工業。在軍事上擴充組織，設立華北駐屯軍司令部，又在各大中心城市遍設特務機關，訓練漢奸，刺探中國軍情。並向北寧路沿綫不斷增兵。同時在成都、北海、海口、上海等地，到處進行武裝挑釁。

九一八五週年紀念日，日軍向駐豐台之二十九軍挑釁，強佔了豐台，且向宋哲元軍長提出「冀察與冀東合流，撤換二十九軍全部反日

軍官」等無理要求。結果因人民堅決反對，未能實現。不久，日本大舉進攻綏遠，綏遠軍民，便自動的燃燒起抗戰烽火。

自綏遠的局部抗戰爆發後，北平、上海等地學生、職業青年、文化人紛紛組織慰勞團北上，許多愛國志士投筆從戎。青島上海等地的日本工廠華工，連續發動反日大罷工，上海文化界、職業界、婦女界的愛國人士，組織了抗日救國會，援助綏遠戰爭，並推動南京政府進行全面抗戰。全國各地皆沸騰起要求和平統一，準備全民抗戰的熱潮。日本帝國主義所挑撥的兩廣事變，就在這種全民的反對「槍口對內」的壓力下，得到了和平解決。

一九三五年底，紅軍經過了二萬五千里的長征，到達陝北，建立了新的抗日民主根據地。次年遣派勁旅東渡黃河，出山西，企圖打通北上抗日的道路，因國民黨派大軍前往堵截，退回師西岸，以求保持國防實力。同時，發出了兩次通電，號召一切中國軍隊，不分派別，不分信仰，組織全國統一的抗日聯軍，團結救國。中共中央也致書國民黨要求停止進攻紅軍，建議兩黨重新合作，恢復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實行三民主義，結成全民族的統一戰線，團結抗日，共同建立中華民主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與國共二次合作的主張，得到了社會正義人士的贊助，一部份過去採取觀望態度的民族資產階級，開始轉向抗日戰線了。國民黨中央許多要員，也痛恨親日派禍黨誤國，而要求一致抗日了，但是，親日份子仍佔很大勢力，對日妥協政策在政治上仍居統治地位，蔣介石迷戀於「先剿共而後抗日」的錯誤主張。因此，南京政府一方面不斷的與日本談判，想以較強硬的態度使本日稍稍讓步，以緩和國內空氣。另一方面仍然嚴禁抗日救國運動，十一月間又逮捕了全國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等七人，全國震動。十二月蔣介石親率大軍到西北，準備再度發動大規模的「剿共」內戰。

（四）西安事變與國內和平的實現

（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

中國共產黨與紅軍堅決主張攜手抗日的影響所及，連當時在西北前線的「剿共軍」張學良、楊虎成部，也深受感動。大部份官兵皆自動要求停止內戰，東北軍更提出了「打回老家去！」的口號，張楊二將領，經歷了十幾年外患與內戰的痛苦教訓，親見全國人民愛國熱潮的奔騰，也不願繼續「剿共」，因屢向蔣介石進諫，但均未被採納。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蔣介石到西安，督促張楊，繼續積極「剿共」，九日，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組織萬餘羣衆，向張楊請願，痛苦陳詞，要求停止內戰，許多下級官兵對繼續「剿共」戰爭的命令，皆表示憤恨。張楊乃再度向蔣氏進言，蔣介石嚴詞拒絕，斥退抗拒命令。十二月十二日，張楊遂以兵諫手段，挾持蔣氏，請求答應「停止內戰，立即抗日」。這便是歷史轉變關鍵的雙十二事變。

西安事變發生後，全國震驚，張學良、楊虎成通電全國，提出八項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衆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等一切政治自由權利；（七）確實進行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日本帝國主義則乘機造謠，兩三次捏造蔣氏身死，並指使漢奸、親日派、托派份子迅速組織大規模的內戰，南京政府在親日派何應欽等把持下，一方面調兵遣將，沿隴海線西上，進攻潼關，又派大隊飛機，轟炸西安。另一方面，電召赴德養病之汪精衛，立即回國，共同進行聯日倒蔣反共的政治陰謀，藉此以擴大國內分裂局面。蔣氏的地位而代之，托派份子張慕陶等奉日本特務機關的指示，亦趕到西安極力煽動倒蔣內戰。

當時中國共產黨聞訊，即派周恩來赴西安，主張和平解決，聯蔣抗日，周氏並親自與蔣介石懇談國內形勢及聯合抗日之必要。一面致電南京政府，一面又與西安當局接洽，提出和平解決辦法。同時，全國各界愛國人士皆紛紛呼籲和平。蘇、英、美、法各國也從中斡旋，不久，張學良陪送蔣介石飛至南京，雙十二事變，遂得和平解決。